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新经济群体的政治参与 及政治整合 (1979—2009)

Xinjingji Qunti De Zhengzhi Canyu
Ji Zhengzhi Zhenghe (1979-2009)

—— 以浙江省东阳市为例

陈玉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新经济群体的政治参与 及政治整合 (1979—2009)

Xinjingji Qunti De Zhengzhi Canyu
Ji Zhengzhi Zhenghe (1979-2009)

—— 以浙江省东阳市为例

陈玉华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经济群体的政治参与及政治整合: 1979~2009 / 陈玉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7-5161-1603-6

I. ①新… II. ①陈… III. ①参与管理—研究—中国—1979~2009
②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中国—1979~2009 IV. ①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5116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胡新芳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7.5
插 页 2
字 数 295 千字
定 价 4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本书通过对一个县的实地调查，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经济群体的崛起及其参政议政的问题，是一本可以引发诸多思考的著作。

在中国，政治与经济，更具体说是政商关系十分复杂。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长期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国家。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格局下，是政治支配经济，而不是经济支配政治。从秦王朝开始，商人投资于政治是最有眼光，也最具有风险意识的投资。有了国家政权，财富迅速扩大，财源流淌不尽。名著《红楼梦》实际描绘了权力与财富的关系。有权就有荣华富贵，无权则一无所有，很快是“白茫茫大地一片干净”。财富因权力来得容易，也因权力失去容易。长期以来，商人始终没有能够发育成为一个具有独立自我意识的阶级，甚至从来没有形成一个严格的阶级。在权力支配经济的格局下，他们为获得财富不得不依附于权力，为获得更多财富或者保护自己的财富，只能与权力发生紧密联系。他们与小农一样，不能自己保护自己，而是依赖权力的庇护。只是他们更有条件建立与权力的紧密关系。而这有可能造成社会不思劳作，动摇农本，所以在历史上商人虽然有钱，但政治社会地位却处于末位。

1949年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消失了，工人和农民成为社会主要成员。社会成员简化，意味着社会活力的不足和财富的匮乏。改革开放是对原有政策的松动。一部分非国有体制下的人群，先是做点小生意，游走于国有体制的缝隙里，后随着政策进一步放宽和财富的积累，经商开厂，财富迅速增长，成为先富群体。一个不同于原有经济形态的新经济及其新经济群体由此崛起。

历史既有创新性，也有连续性。新经济群体的崛起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出现的。她的崛起本身便与政治密切相关。没有改革开放政策，她不可能迅速成长为一个有影响的群体。她的进一步发展也离不开政策支持和政府保护。由于她的存在和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和地方财力增长，政商关

系因此进入到一个“蜜月期”。当然，在强大的国家政权面前，新经济群体的力量还是软弱的，他们远远没有形成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完整阶级去影响政治，更遑论支配政治。他们更多的是运用古老的手段，以经济力量去影响和支配某个政府官员，从而寻求政治庇护或者扩张自我利益。而这必然带来政府腐败。如何将新经济群体纳入政治制度的轨道，成为执政党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政治具有鲜明的特点，就是当政者可以利用其长期执政地位广泛吸纳社会精英，形成精英吸纳机制。如历史上的科举制，将天下英才都吸纳到政治体制中。只有那些非体制性的精英才成为政府的反叛者，如洪秀全、孙中山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经济群体的崛起，执政党的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将新经济群体吸纳到正式的政治体系中来，如他们中的精英人士进入人大和政协，有的还当选为执政党的党代会代表。他们因此有了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成为一个具有独立经济意识的政治人。除了经济地位以外，其政治地位也得以上升。因为他们与其他社会阶层一样，都具有平等的国家公民身份，且具有较大经济影响力。当然，从总体上看，在中国，新经济群体发育还很不成熟。一则他们的早期成长与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来路不明的“原罪”。二则他们的财富增长太快，连自己都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许多人还处于“富而不贵”的状态。三则他们中间的许多子女正在如这一群体的祖先们一样，只是通过过分张扬的“炫富”来“显摆”，甚至“为富不仁”，从而造成社会的“仇富”心理。处于这样一个复杂状态的群体，他们参与政治的动机、方式、结果都十分复杂且变化多端。仅仅依靠一般的理论推断会将复杂多变的事实简单化。

本书的一个特别之处，就是以浙江省中部的一个县为例，对新兴经济群体的崛起及其参政过程进行了具体的描述。早在1990年代，我和张厚安先生在当地大学老师卢福营的陪同下去过该县。这个县的突出特点是人多地少，土地贫瘠。正因为如此，这个县早有经商读书的传统，也算是自我开辟新的生存之道。即使是计划经济体制时代，仍然有一些人外出做点小生意。因为生存的逻辑毕竟比政治的逻辑更强大。而改革开放的宏观政策则为这里的人经商开厂打开了大门。我们当时参观的一个村生产丝线，不仅造成国营企业的破产，而且几乎形成占全国产量三分之一的规模。由此使我们惊叹民营经济的巨大活力！而此后该县的新经济更是获得难以想象的发展。本书作者沿着我们的足迹，对该县新兴经济群体的崛起及其参

政过程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并通过本书展示了这一过程。由此可以丰富我们对中国经济群体及其参政过程的认识。

社会生活是复杂多变的。对社会生活的考察不仅仅是一种现象的描述。作为一部理论著作，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提出理论命题，进行理论探讨。美国政治学大家亨廷顿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即经济群体崛起后造成参与扩大而可能引发政治动荡。但他提出这一观点时，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且一个理论命题也不可能穷尽所有事实。本书根据其实地调查，探讨了中国经济群体与政治的关系及其复杂性，揭示了中国事实背后的历史和政治逻辑，认为中国经济群体的政治参与没有引发政治动荡，反而是政治吸纳，从而丰富了相关的政治与经济的理论学说。

本书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形成的。他尽管是案例地的当地人。但作为一个年轻学生要去做具有政治敏感性的选题调查，还是相当困难的。访谈对象有钱财、有地位，甚至刻意回避政治。这大大增加了他个案调查的难度。特别是对这样一个复杂性的课题的驾驭，他当时的能力还相当有限。尽管我们谈了多少年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但真正结合好却非易事。要么学无问题，只是泛泛而论；要么问题无学，只是材料堆砌。为改变这一状况，我从本书作者这一届开始，要求学生既要有扎实的社会调查，同时也要有深度的理论建树。而这对作者确实是一个挑战。期间，他曾经有过动摇而受到我过于严厉而极少有的训斥。好在他能经受我的敲打，坚持下来。甚至为此在已找好工作的情况下又延长了半年的学习时间，以精心写作论文。毕业后他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对论文进行了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由此才有了本书。

本书只是作者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希望在此基础上能够坚持不懈，使其研究不断有所提升和进步！

徐 勇

2012年8月31日于武汉

目 录

序言	徐勇 (1)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与研究的意义	(1)
一 选题的缘起	(1)
二 研究的意义	(3)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述评	(4)
一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研究视角	(5)
二 公民政治参与理论的研究视角	(8)
三 精英理论与治理理论的研究视角	(10)
四 政治整合理论的研究视角	(12)
第三节 研究设计	(19)
一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19)
二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20)
三 核心概念	(22)
第四节 研究区域概况	(28)
一 自然地理	(28)
二 历史沿革	(29)
三 社会经济	(31)
四 地域文化	(35)
第五节 论述逻辑	(39)
第二章 新经济群体的政治冷漠与政治排斥 (1979—1988)	(41)
第一节 新经济群体的“破茧而出”	(41)
一 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	(42)
二 新经济群体的“破茧而出”	(43)
第二节 “闷声经营”与普遍的政治冷漠	(48)

一	群起创业与“闷声经营”	(49)
二	普遍的政治冷漠与“象征型”政治参与的生成	(52)
第三节	政治排斥与初步的政治松动	(60)
一	刚性的意识形态与持续的政治排斥	(61)
二	“四个轮子一起转”与初步的政治松动	(65)
第四节	小 结	(74)
第三章	新经济群体的被动式参与与政治松动 (1989—1992) ...	(76)
第一节	新经济群体的曲折发展	(76)
一	经济体制改革的低潮	(76)
二	新经济群体的曲折发展	(77)
第二节	寻求政治庇护与被动式参与的扩大	(80)
一	外部环境恶化与寻求政治庇护	(81)
二	危机应对与被动式参与的扩大	(85)
第三节	治理重心调整与政治控制的松动	(92)
一	治理重心转移与地方政府的角色转型	(93)
二	政治控制的进一步松动与政治安排的正式登场	(97)
第四节	小 结	(98)
第四章	新经济群体的动员式参与与政治吸纳 (1993—1997)	(101)
第一节	新经济群体的快速崛起	(101)
一	经济体制改革的提速	(101)
二	新经济群体的快速崛起	(103)
第二节	体制认同与动员式参与的扩大	(107)
一	体制接纳与政治认同的形成	(107)
二	精英吸纳与动员式参与的扩大	(113)
第三节	政商“利益互补”与初步的政治吸纳	(132)
一	政商“利益互补”与放手发展私营经济	(133)
二	新型经济发展战略与初步的政治吸纳	(136)
第四节	小 结	(140)
第五章	新经济群体的自主式参与与政治融合 (1998—2009)	(142)
第一节	新经济群体的全面提升	(142)

一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142)
二	新经济群体的全面提升	(144)
第二节	融入体制与自主式参与的兴起	(147)
一	政治认同与寻求融入体制	(147)
二	政商良性互动与自主式参与的兴起	(150)
第三节	政商“利益共生”与初步的政治融合	(209)
一	政商“利益共生”与招商引资热潮	(210)
二	积极的政治吸纳与初步的政治融合	(215)
第四节	小 结	(224)
第六章	结论与讨论	(226)
第一节	本书的核心问题与基本结论	(226)
第二节	吸纳与依附：“本土”的行为逻辑	(230)
一	吸纳：国家的行为逻辑	(230)
二	依附：新经济群体的行为逻辑	(235)
第三节	政治整合与“亨廷顿难题”的初步破解	(239)
附 录		(242)
参考文献		(245)
后 记		(268)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选题的缘起与研究的意义

一 选题的缘起

“政治参与扩大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在传统社会，政府和政治通常只与少数精英有关。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工匠和商人，他们通常或许能够认识到，或许不会认识到政府的活动是怎样影响他们的生活的。”^①然而，“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人们民主意识的增强会促使其社会挫折感的增加。这种社会挫折感促使人们向政府提出各种要求，并导致政治参与的扩大以满足这些要求。但由于政治制度化程度低，人们对政府提出的要求很难或不可能通过制度化渠道予以表达，也很难在政治体系内部得到协调与整合。因此，政治参与的急剧增加会引起政治的不稳定，也就是出现所谓‘参与的危机’”。^②由此，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第三世界的许多新兴国家由于公民政治参与，尤其是新社会阶层政治参与的急剧增长反而出现了“政治动荡”的局面，本书将这种现象统称为“亨廷顿难题”。

“亨廷顿难题”是否放之四海而皆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现代化能否携手共进？在这方面，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提交了很好的答卷，“在自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9.8%。不仅如此，中国还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平稳转型，没有出现其他转型国家那样的剧烈经济和政治波动。可以说，中国在过去

① [美] 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汪晓寿、吴志华、项继权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② 转引自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亨廷顿教授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对该命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参见[美]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由此，在本书中，笔者将其称为“亨廷顿难题”。

三十年成就了经济增长和体制转型的双奇迹”。^①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在公民政治参与取得长足进展的同时，却没出现“政治参与爆炸”现象，反而初步地破解了“亨廷顿难题”？本书的“核心研究假设”即执政党与国家对各社会阶层的政治整合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通过逐步扩大公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空间，各社会阶层尤其是新社会阶层与政治体系之间实现了有效的互动，其基本利益诉求得到了较好的保障，从而初步地化解了“政治参与爆炸”的压力。

毋庸置疑，个体私营经济的崛起是中国经济增长和体制转型的“双奇迹”的一个重要支撑力量，它在推动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提供就业岗位、繁荣城乡市场等方面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作为个体私营经济的人格化代表——新经济（精英）群体^②还成为重要的政治行动者，“随着党和国家相关政策的调整，他们逐步摆脱了政治上的不安全感，并且大步地跨入政坛，活跃于人大、政协、工商联等会议上，活跃于政府政策的制定过程中”。^③为了论证本书的“核心研究假设”，笔者特选取了浙江省中部的一个县级市（东阳市）作为研究区域，以改革开放后新生成的新经济群体为研究对象，拟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对地方政府政治整合与新经济群体政治参与的互动关系及其历史变迁进行历时态的考察，力求挖掘新经济群体政治参与的“本土经验”及地方政府整合该群体的“特定方式”。

本书之所以选取以一个“县”为研究区域，一则“县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发端于战国，定制于秦的县制在中国存续了两千多年时间，至今仍然是中国最为完整的基本政治单位”。^④二则“县，是我国农村基本的区域性政权设置，是农村经济、政治生活的区域性枢纽，是我国地方国家机构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基本行政区域单位。它始终承担着对中央政府、上级地方政府所制定政策的贯彻执行和对本地域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双重管理的任务，保持了持久的生命力

① 姚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国际经济评论》2010年第1期。

② 本书把新经济精英群体简称为新经济群体，关于新经济精英的界定请参见导论的第三节第三部分。

③ 陈家喜：《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影响》，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④ 徐勇：《田野与政治——徐勇学术杂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和对不同时代的超级适应性”。^①三则本书拟采取案例型论文的写作方法,选取一个县级市作为研究区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便于进入现场进行田野调查;并且可以相对充分地收集到各类档案资料、地方志、地方党委机关报等地方文献,从而可以更好地“透视”地方政府政治整合与新经济群体政治参与的交互作用及其历史变迁。作为中国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浙江新经济群体的政治参与程度相对较高,浙江地方政府对该群体的政治整合实践也比较丰富,浙江的相关经验及呈现的问题对于中国其他区域无疑具有较大的借鉴价值。之所以选择东阳市作为调查的区域样本,主要考虑到东阳是笔者的故乡,相对容易进入调研现场;她的个体私营经济起步较早、经济发展水平在浙江省居于中等水平;新经济精英的政治参与比较活跃,在整个浙江省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二 研究的意义

总体而言,本书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此外,它还具有较强的政策应用价值。

(1) 理论意义。以往的研究大多只注重社会(新经济群体)的能动性,而鲜有政治整合的视角。但是,在当代中国,执政党与国家掌握着优势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具有强大的政治吸纳与行为管制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新经济群体的政治参与是在执政党与国家的主导下有序推进的,执政党与国家有效地掌控着该群体政治参与的规模、形式与程度。因此,要系统地考察新经济群体的政治参与,决不能单向度地考察该群体的能动性,还必须引入政治整合及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研究视角。因此,本书运用政治整合及国家与社会互动理论,力求建构基于中国“本土经验”的新经济群体政治参与理论,并与亨廷顿的政治参与理论展开学术对话。

(2) 理论意义。近年来,随着新经济群体政治参与的迅速扩大,学界与政策研究部门给予其广泛的关注。但是,在既有的研究中,较少有研究者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很多研究文献还停留在简单的“举例证明”的阶段,得出的研究结论尚缺乏足够的事实支撑。不少研究者还直接移用一些西方的理论学说,诸如公民政治参与理论及与市民社会理论,采用

^① 陆凯阳:《当代中国县级政府体制与运行机制研究——兼以湖北省英山县为例》,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1年,第1页。

“循环论证”的方法，他们的结论往往流于“应然”状态，而与新经济群体政治参与的“实践形态”大相径庭。笔者通过对浙江省东阳市长达7个多月的蹲点调研，除了占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外，还对40多名党政官员、新经济精英展开了深入的访谈，对东阳市新经济群体政治参与的“实践形态”形成了比较系统深入的认知。虽然本书的立意基础并非是政策研究，但是从中得出的研究结论还是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对于执政党与国家掌握新经济群体的政治心态、政治参与的特征及发展趋向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从而有助于其综合运用各种方式将该群体整合进现行体系中，避免这股“非制度化的力量在体制外集结”^①。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述评

私营企业主作为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利益结构和社会关系重新组合的产物，无论是从人员结构，还是利益结构，都已经形成了不同于其他阶层和群体的社会经济特征。^②作为一个特殊的新社会群体，自其产生伊始，私营企业主阶层便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总体而言，学术界对私营企业主阶层^③政治参与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七一讲话”^④之前，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围绕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社会属性展开的。“对于私营企业家社会属性的判断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涵，因为判定企业主的社会属性，其实就是在判定他们的政治属性，就是在判断他们究竟是属于体制内的社会力量，还是体制外的反对力量。”^⑤“七一讲话”明确地把私营企业主阶层界定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赋予该阶层以平等的政治地位。此后，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日趋活跃，政治参

① 张静：《政治社会学及其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3期。

② 李宝梁：《从共生走向和谐——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成长的社会生态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③ 在既有的关于新经济群体政治参与的研究文献中，基本上是以私营企业主阶层为研究对象。因此，在本书的文献梳理中，笔者是以私营企业主阶层来代指新经济群体，以私营企业主来代指新经济精英。

④ “七一讲话”即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参见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4—299页。

⑤ 陈家喜：《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影响》，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与的层次、规模与频率有了很大的提升,逐步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与此同时,学术界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崛起及其政治参与的研究也快速升温,研究主题向纵深扩展,研究队伍逐渐壮大。总体而言,学者们主要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公民政治参与理论、精英理论与治理理论以及政治整合理论对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崛起、政治参与及其政治社会影响进行考察与分析。

一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研究视角

“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分化程度较低、分化速度缓慢、具较强同质性的社会。社会的政治中心、意识形态中心、经济中心重合为一,国家与社会合为一体以及资源和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国家具有很强的动员与组织能力,但结构较为僵硬、凝滞。这种结构形态可称为‘总体性社会’。”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上‘自由流动空间’逐渐扩大、‘自由流动资源’不断增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再一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①毋庸置疑,作为一个拥有庞大经济资源的新社会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崛起及其政治参与势必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产生一定的冲击。

有些学者认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崛起及其政治参与有助于中国市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对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产生了相当正面的作用。例如,董明指出,“私营企业主是我国与规范的市场经济运行最为接近的一个社会阶层,它在当下我国公民社会的逐渐显形过程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已经并将继续成为我国公民社会形成的一个重要内驱力”。^②赵丽江也认为:“中国私营企业家阶层政治参与的实现,开始形成了私营企业家阶层与政府关系的新模式——理性的契约模式。这冲击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全能政府的运行模式,为中国市民社会的形成提供了基本条件。”^③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以工商联(商会)、行业协会为研究对象,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韩福国指出,“在中国的制度转型中,由于工商联组织具有‘社会代理’与‘国家代理’的双重代理功能,它得以成功地促使国家价值观的改变、政治结构的开放与多元社会结构的合作,从而较好

① 孙立平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② 董明:《私营企业主阶层崛起与公民社会在当代中国的成长性》,《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③ 赵丽江:《中国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页。

地平衡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使国家的政策能够有效地转化为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使得社会的发展变化能有效地获得国家的制度保障”。^① 郁建兴认为，“温州商会拥有较强的民间性、自治性，已开始成为温州地方治理体系的新兴主体”。^② “在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博弈中，一种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已然出现，温州商会突出的治理绩效使其成为政府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③ 陈剩勇则指出，“温州民间商会、行业协会和异地商会已经初步具备了公民社会之面向”^④。“温州民间商会和行业协会作为一种社会中介组织，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制定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主要是行业发展政策），主导或影响了地方工业发展的方向。这就以一种相对有序的方式将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利益组织、集中和传达到地方政府的决策体制中，从而促进了政府和社会某种程度上的制度化合作。”^⑤

与此同时，也有些学者指出它的影响并不显著。例如，王晓燕认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制约着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程度，在国家的‘超经济强制’下，私营企业主与国家发生了‘关系性依附’，他们的政治行动深深嵌入国家与社会关系之中”。^⑥ 陈家喜也认为，“从东欧式的市民社会视角观察中国民间商会的发展，势必会得到失望的结论。中国的民间商会不是与国家相对抗的组织，而是在国家的襁褓中成长起来的。虽然它们越来越依赖于私营企业的支持和认同，但是离开了国家的政策支持和赋予的制度空间，它们将寸步难行。毋宁说，它们是初步形成中的市民社会，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中介和桥梁，而非寻求与国家相对抗的利益团体，它们在政府与企业之间寻找自主发展的空间”。^⑦ 无独有偶，一些国外的研究者

① 韩福国：《民营经济制度变迁中的工商联：组织的双重代理》，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② 郁建兴等：《民营经济、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治理》，载史晋川主编《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473 页。

③ 郁建兴等：《在参与中成长的中国公民社会：基于浙江温州商会的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④ 陈剩勇等：《组织化、自主治理与民主——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59 页。

⑤ 陈剩勇：《另一领域的民主：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的政治学视角》，《学术界》2003 年第 6 期。

⑥ 王晓燕：《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

⑦ 陈家喜：《形成中的市民社会：民间商会发展的空间与限度》，《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2 期。

也持这种观点。通过对福建省厦门市的实地考察,王达伟(David L. Wank)认为:“中国的私营企业主缺乏作为‘利益集团’的统一的身份认同,社会背景、经营规模、经济政策和政府官员支持上的差异将他们分割成不同的群体,每个群体都面临着不同的机会和限制,因而采取了不同的联盟政策,在私营企业主中很难产生市民社会。与此相反,他却发现在私营企业主和地方官员之间存在一种‘共生庇护关系’。”^①托马斯·海贝勒(Thomsa Heberer)则指出,“中国至今还没有建立正式的、非官方的私营企业家协会,基于目前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文化,存在一个完全独立的协会是不可想象的。大多数企业家对与国家的争论没有兴趣,他们也没有打算要建立压力集团,而是谋求与国家行政机关进行合作和发展关系,也就是说,非正式地寻求利益的实现”^②。

总体而言,持第一种观点的研究者注意到了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崛起对中国社会利益结构、政治权力结构所具有的正面“改造”功能。诚然,从长远来看,“作为迄今仍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具市场经济特性的一个社会阶层”^③,私营企业主阶层的崛起及其政治参与将有力地推动中国市民社会的成长,这种态势在中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已初现端倪,并且还出现了“强国家—强社会”的结构形态。^④但是,就“实践形态”而言,第二种观点更有说服力。由于“私营企业主参与的动机和目的具有极强特殊主义,即具有极强的个人性和排他性”^⑤。并且,中国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执政党改革开放政策的“产儿”及主要的受益者之一,该群体成员根本就不存在挑战体制的原生动机。由此,他们主要是以个体化政治参与的形式寻求“融入体制”,以获得政治体系的认可与接纳,而远没能以组织化的方式形成一种“体制外的力量”对现行体制进行改造与重塑。

① David L. Wank, “Civil Society in Communist China? Private Business and Political Alliance”, In John A. Hall (ed.), *Civil Society: Theory, History, Comparis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p. 6.

② [德] 托马斯·海贝勒:《作为战略群体的企业家:中国私营企业家的社会与政治功能研究》,吴志成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180页。

③ 李路路:《转型社会中的私营企业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④ 贺东航:《现代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对晋江模式的一个尝试性解答》,《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年第4期。

⑤ 徐露辉:《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4年,第24页。

二 公民政治参与理论的研究视角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中产阶级^①与民主政治的关系就成为政治学界经久不衰的命题。作为政治发展理论的集大成者，亨廷顿教授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可能具有保守性，也可能具有革命性。在发展中国家，如果传统社会的政治制度能够适应在现代化过程中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的经济自由需要和政治参与需要，那么中产阶级就能够成为拥护传统专制制度的保守力量，反之就会成为革命的力量。”^②

近年来，私营企业主阶层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已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其中，偏重理论研究的学者往往将私营企业主阶层视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例如，赵丽江认为，“私营企业家阶层参与政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大事，是对传统的政治参与结构的重大突破。私营企业家阶层的政治参与代表了中国新的利益主体进入体制内的政治过程，扩大了政权的合法性基础”^③。朱光磊指出：“私营企业主等‘新阶层’政治参与的扩大在总体上有利于国家的民主和法治化进程，有利于巩固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④ 敖带芽则认为：“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为我国民主政治的生长提供了机遇。私营企业主的政治参与带动了其他社会阶层公民的政治参与，使整个社会政治参与广泛化。政治参与由以往的远离社会大众逐步转变到为社会普通群众所共享，从只有少数公民参与到涉及其利益的决策，扩大到某些决策涉及其利益的公民都能参与到该政治过程中，使具有政治参与要求与行为的公民在全体社会成员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⑤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则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他们大多把私营企业主阶

① 美国社会学家 C. 赖特·米尔斯按照私有产权的状况与劳动的性质，将中产阶层分为老中产阶层和新中产阶层。前者指拥有少量独立资产、自主经营、从事体力与脑力混合型劳动的小业主、小商人、小农场主等群体，后者是以薪金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脑力雇佣劳动者，即通常所说的白领阶层。按照这一划分方法，中国的中小型私营企业主可以划归为老中产阶级。转引自王晓燕《中国“老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② [美] 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7页。

③ 赵丽江：《中国私营企业家的政治参与》，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④ 朱光磊、杨立武：《中国私营企业主政治参与的形式、意义和限度》，《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⑤ 敖带芽：《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6页。